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五編 20

政治意識形態、 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

臺灣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研究

陳康芬·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刊

五 編

第 20 冊

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
——臺灣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研究

陳康芬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臺灣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研究／陳康芬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4+234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五編；第 20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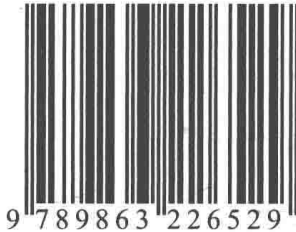
ISBN：978-986-322-652-9 (精裝)

1. 臺灣文學 2. 文學評論

733.08

103001773

ISBN-978-986-322-652-9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五 編 第二十冊

ISBN：978-986-322-652-9

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
——臺灣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研究

作 者 陳康芬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五編 24 冊 (精裝) 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
——臺灣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研究

陳康芬 著

作者簡介

陳康芬，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現為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專長領域為台灣現當代文學、通俗文學、文學社會理論、文化研究與文化論述。著有《古龍武俠小說》（淡江大學碩士論文，1999年）、《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台灣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研究》（國立東華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政治意識形態、族群歷史與客家書寫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研究計畫成果，2008年）、《斷裂與生成——台灣五〇年代的反共／戰鬥文藝》（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年）。

提 要

本論文試圖從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之間所形成的互涉關係，研究台灣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的歷史意義。反共文學體制的出現既反應（執政的）國民黨透過政治形態主導特定文學類型發展的現象，也可以作為觀察「反共」文學觀念如何因散佈流通而取得文學正當性的權力運作的概念對象。因此，本論文認為反共文學體制內的歷史現象，並不能只是簡化為國家暴力的結果，而可以將之理解為「文學價值觀如何為政黨政治意識形態所主導、並制約於文學歷史的客觀現實發展環境的歷史特徵」。

這些特徵包括「反共」目的與國民黨革命建國意識形態之間所形成的歷史因果關係與精神結構、「半官方」性質的文學組織化、三大文藝運動的社會控制與其中所內蘊的社會衝突、文藝論述的流變、反共敘事的道德化模式、以及受限於政黨建國意識形態（三民主義建國）、歷史現實（反共復國）的敘事想像。這些特徵顯示文學與政治之間既是對抗又是協商的複雜權力關係，同時也說明反共文學在戰後臺灣的文學歷史的特殊屬性，在斷裂「臺灣新文學傳統」的顯性歷史特徵之外，還夾藏著透過文化／文學體制所收編、帶有延展意義的隱性發展面向。

本論文認為這個影響包括：政治權力透過與民間文化／文學知識份子社群之間的合作關係，主導與其政治（／建國）意識形態對等或相容的文學類型發展；國家文學政策導向與自由市場經濟社會結構之間難以整合而發展出的「不均衡現代性」、以及文藝論述流變在傳統性、現代性之間不穩定，但持續進行的知識權力鬥爭、並獲得體制發展的（中國右翼）民族國家想像的文學邏輯。

帶有（中國右翼）民族國家想像的文學邏輯，顯示民族文化傳統與西方文明現代性接軌過程中，透過敘事的寫實主義的美學形式，以及文化層面所突顯的人性、善惡、道德等普世性價值，轉化到政治民族自我認同的正當性。而敘事的反共想像，則表現在鞏固文化民族主義的國家意識形態與對應國際現實的「自由中國」形象。前者以儒家倫理的「家－國」秩序為基礎，後者為國民黨政權「右翼中國」的威權體制型強民主統治形象。這些對臺灣文學中「臺灣鄉土」的體制發展都具有相關的影響。影響包括：無關政治性或無左翼思想傾向的政治性與社會性內涵；符合政黨政治力所規範的文化民族主義傾向，其中最重要的傾向，包括：以反日本的漢民族意識與帶有族群屬性的鄉土意識；正向的人性（人道）主義與鄉土烏托邦的美學性文學思維。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的形成	1
第二節 研究主題、概念界定、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9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處理	15
第四節 論文章節要義	18
第二章 反共文學的前歷史與反共文學體制	21
第一節 反共文學的前歷史	23
壹、民族主義文藝運動	24
貳、「中國文藝社」	33
參、國共合作下的文藝組織	36
第二節 反共文學機制的形成與體制的組織化運作	40
壹、中國文藝協會社群	41
貳、軍中系統	44
第三節 體制性文學生產、社會控制與複合式文學社會體質	47
壹、體制性的反共文學生產	48
貳、社會控制	51
參、複合式的文學社會體質	52

第三章	五〇年代三大文藝運動的文學社會關係	55
第一節	一九五一年軍中文藝運動	56
壹	政治目的	57
貳	革命歷史淵源	58
參	現代化中國想像	62
第二節	一九五四年「文化清潔運動」	67
壹	「文協」社群的支持	67
貳	「不均衡現代化」	73
參	「三害」現象	78
第三節	一九五六年「戰鬥文藝運動」	81
壹	國家文藝政策化	81
貳	複合式社會體系的衝突	82
參	質的提昇	85
第四章	文藝論述在三民主義建國意識形態中的 收編、排擠與興起	93
第一節	反共文學體制的官方文藝論述	95
壹	三民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學政治想像	97
貳	「主義」話語的黨國文學論述	103
參	從「主義是從」到「領袖是從」的政治文 學觀	104
第二節	反共文學體制的民間論述	108
壹	「五四」新文學啓蒙傳統與先行的文學 革命	109
貳	體制性五四文學傳統	113
參	西方現代主義	120
第三節	官方與民間文藝論述之間的流變現象	123
壹	任卓宣國家主義的排擠	124
貳	現代主義未完成的「不徹底現代性」	126
第五章	反共敘事的道德原則、民族國家自我型塑 與現代性自我	131
第一節	反共小說中的國民黨正當性論述	133
壹	「人性」價值世界觀	135
貳	「擬宗教」(quasi-religious) 價值世界觀	142

參、	「倫理化」的民族國家道德價值觀	148
第二節	反共敘事中的共產黨想像	153
壹、	非人性化、怨恨心理與社會階級意識	153
貳、	個人主義、社會階級鬥爭與共產黨的黨性	160
參、	愛情想像、現代性自我與民族自我形塑	166
第三節	建國意識形態、民族想像與壓抑的現代性	170
壹、	政黨意識形態與民族國家想像	171
貳、	文化民族主義國家與社會公民意識	172
參、	限制性的否定個人	174
第六章	臺灣歷史主體？亦或中國歷史主體？	
—	反共小說敘事歷史主體的難題	177
第一節	反共敘事的國族／國家寓言：家仇——國恨——國際正義	178
壹、	中國右翼新文學的家國想像	179
貳、	現代化、政黨政治倫理與社會階層	182
參、	「自由中國」的正義神話	188
第二節	「現代性」的未完成	194
壹、	「傳統性」所投射的文學敘事想像	195
貳、	「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哀歌	198
參、	個人式的民族歷史救贖敘事	200
第三節	「三民主義建國——反共復國」意識形態對臺灣文學歷史發展的影響	202
壹、	臺灣孤兒意識、祖國意識與「三民主義建國——反共復國」意識	203
貳、	被消滅的「左翼臺灣鄉土」	209
參、	反共文學體制內的「臺灣鄉土」	213
第七章	結 論	221
	參考書目	22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的形成

反共文學是代表中國右翼政治勢力的國民黨（以下簡稱中國右翼）來台延續中華民國歷史所扶持的文學類型，進而主導了臺灣五〇年代的文學發展語境。對於這段文學歷史，除維護當時國民黨官方立場的文學史論者，如劉心皇、尹雪曼、司徒衛等，認為反共文學是承繼中國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正統，並以「自由中國新文學」定位之外，其他不管是本土派或大陸派，皆不因政治意識形態如何南轅北轍，一致採取對立面的批判立場。

在國民黨官方立場、本土派與大陸派之外，夏志清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排除政治、社會、革命等價值意義，回歸到文學本身的藝術審美主體，作為書寫典範的審核標準。夏志清訴諸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價值觀點，以中國左翼文學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主體、含納中國右翼文學在臺灣的發展，可以視為臺灣文學史書寫的西方現代主義立場的前導。

夏志清挑選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與姜貴的《旋風》、《重陽》為反共文學的經典之作。他的人道主義價值觀，注意到《秧歌》對於人性描述背後的歷史感，指出張愛玲《秧歌》的「文學反共」價值，並不在於共產黨統治的人生生活描述，而是共黨統治對於中國傳統感性與風俗起了怎樣的作用；《赤地之戀》在此基礎上，擴大到共黨暴政的形形色色，雖有敗筆之嫌，但文學意向豐富的隱喻直追《秧歌》（註1）。

（註1）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2001年），頁335～371、478～498。

夏志清的觀點初步發現傳統性在中國（含納臺灣反共）現代小說中，所開出的美感經驗為主的感知結構與敘事風格，但設限於以西方文學書寫典範作為參照比較的批評立場，未能深入剖析傳統性在中國現代小說發展中的關鍵意義，以及這些特質在趨向現代化、或與現代性結合之後的複雜影響。

本土派、大陸派在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中，是以相對於國民黨威權的民間立場為同一陣線，以葉石濤與陳映真為代表。但兩人即隱含「臺灣右翼——臺灣本土」與「中國左翼——臺灣鄉土」意識上的歧出。在八〇年代之後，臺灣社會經歷中國結／臺灣結的矛盾後，延伸至九〇年代政治立場的統獨對立，臺灣文學的發展至此明顯分裂為帶有民族政治意識形態的本土派與大陸派。

中國左翼的概念較為複雜，就政治身分認同來說，是指作為與國民黨共同競爭中國建國政權、並作為對立面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就文化意識來說，包含指涉共產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等概念意涵；就文學傾向來說，泛指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普羅文學／大眾文學）等。而「中國左翼——臺灣鄉土」脈絡指涉出陳映真的兩種思想意識特徵：左傾的中國民族意識與臺灣鄉土現實批判意識。前者是他的民族政治立場；後者是他的文學社會立場。

「中國左翼——臺灣鄉土」意識最早始於臺灣日治時代臺灣新文學「反帝反殖民」的左翼傳統，而延續到二二八之後被國民黨政權消滅，直至七〇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才奇蹟似地接續此傳統。

「臺灣本土」的概念則可以追溯到日治時代郭秋洞在臺灣新文學「反帝、反殖民」傳統中，以「在地的」作為反殖民的文學表現特徵，其鄉土概念傾向於實質性的鄉土。這與臺灣新文學左翼系統，傾向於現實批判的抽象性鄉土相當不同。陳映真立場的臺灣鄉土概念，可視為日治時代臺灣新文學左翼系譜的抽象性鄉土繼承。葉石濤的臺灣本土文學立場，則可視為日治時代臺灣新文學傳統中實質性鄉土的延申，但在民族政治立場，則由實質性鄉土繼續發展「本土」，訴諸實質土地與情感，並以此為臺灣民族意識的正當性。

葉石濤在其《臺灣文學史綱》中，批評臺灣五〇年代反共文學所代表的統治霸權：「幾乎由大陸來台第一代作家所把持，所以整個五〇年代文學就反映出他們的心態。他們在大陸幾乎都是屬於統治階級，依附政治權力機構而生存，所以大多數擁護中國傳統的孔孟思想，且有根深蒂固的法統觀念，缺

乏民主；科學修養。因此大陸淪陷後轉到臺灣以後，充滿他們心靈的是沮喪和仇恨。國破家亡的沉重包袱壓碎了他們的心靈。反映這種心境的文學，自然是對中共政權的無限憤慨和怨仇；文學必須紮根於人道主義的肥沃土壤，開起花朵來才有文學的本質和效能。不幸，他們的文學來自憤怒和仇恨，所以五〇文學所開出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使得他們的文學墮為政策的附庸，最後導致這些反共文學變成另人生厭的、劃一思想的、口號八股文學〔註2〕。」

葉石濤的批評，融雜了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反殖民／反帝國傳統、文學的人道主義觀點，以及傾向臺灣本土政治立場，對反共文學作出了文學價值的判斷。

彭瑞金的立場更激烈：「『反共文學』大鍋菜式的同質性（公式化）、虛幻性和戰鬥性等反文學主張，是它的致命傷，所以儘管它霸佔了整個臺灣文學發展的空間，文學的收成還是等於零。……令人可惜的不只那些文藝園地，而是黃金般的臺灣文學十年歲月被埋葬了〔註3〕。」

葉石濤與彭瑞金訴諸臺灣本土政治立場，未能將反共文學視為特殊政治文學類型，以政治宣傳之作籠統概括其中的優秀創作；而隱含於臺灣本土政治立場的「中國外省——臺灣本土」的對立族群意識，也未能正視五〇年代國民黨來台發展而成為臺灣歷史一部份的客觀性，對反共文學未能公允評價。

之後雖有陳芳明以後殖民（／後現代）論述作為書寫臺灣文學史的策略，宣稱「要建構一部臺灣新文學史，就不能停留在文學作品的美學分析，而應該注意到作家、作品在每個歷史階段與其所處時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陳芳明對臺灣「殖民地社會」的總的性質〔註4〕，視「（右翼）中國」為國民黨政權殖民臺灣文化符號的「文學獨台」的隱含命題，並未能將反共文學的政治性完全「解殖」。但陳芳明以文學歷史為主軸，結合現代主義文學理論的論述方式，開啓訴諸臺灣本土立場的多元歷史面向研究的可能性，以及奠定臺灣本土現代派論述的基礎。

〔註2〕 葉石濤：《臺灣新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年）頁88～89。

〔註3〕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1年），頁75～76

〔註4〕 陳映真對陳芳明文學歷史觀點的論述用語。陳映真：〈以意識型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收錄於《反對言偽而辯》（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頁7～48。

大陸派的臺灣文學史論者，包括劉登翰、古繼堂、趙瑕秋、呂正惠、曾建民、陳映真等人，在唯物辯證史觀的影響下，都能跳脫直線式歷史脈絡的文學史書寫，但對於反共文學的歷史詮釋，仍有不盡精密與主觀臆斷之處。

如劉登翰在其主編的《臺灣文學史》中，雖然注意到不同歷史脈絡下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潮，以及這之中所反應的消長現象，但只針對現象作梳理，未能繼續探索反共現象發生的深層結構，而對於反共文學的定位，也以政治宣傳性「扭曲歷史與生活真實的虛妄」，否定其存在價值〔註5〕。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古繼堂的《臺灣小說發展史》中。古繼堂以客觀文獻資料勾勒出五〇年代文學反共的歷史輪廓，但對於反共作家與小說的「反共」心態，仍多有可議之處：「五十年代臺灣的反共文學，是一種人爲的文學潮流。不僅被廣大臺灣同胞厭惡，而且被他們自己的第二代所唾棄〔註6〕。」

到了《簡明臺灣文學史》雖不復出現明顯的民族意識情緒，但仍有囿限於文學的政治意識形態與藝術價值判斷之處：「從『反共文學』自身的創作而言，以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創作姿態，構成一種反歷史的懷舊復仇文學面貌；以嚴重的模式化與公式化創作，形成千篇一律的『反共八股』；以鮮明的政治企圖與御用性格，充當了官方政策文學的傳聲筒；『反共文學』的種種非文學創作弊端，不僅遭到了社會讀者的普遍唾棄，也使它自身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註7〕。」

趙瑕秋、呂正惠主編的《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對於五〇年代、各種文學類型在文學場域的位置與對應關係，最爲深刻。但其中隱而未現的「鬥爭」歷史觀點，未能觀照到反共文學與（國民黨）中國右翼建立現代化民族國家之間的歷史脈絡：「縱觀五六十年代的文壇，儘管懷鄉文學處於支流地位，女性書寫呈現弱勢生存狀態，鄉土文學被放逐於文壇邊緣；但這些非主流型態的文學存在，與前述的反主流論述話語一道，爲打破『戰鬥文藝』運動的一統天下，挑戰和質疑官方的文化霸權，呈現與復原那個時代完整的文學風貌，有著不可或缺的功績與意義〔註8〕。」

這幾個文學史論的立場，大致上可分成四個詮釋脈絡：以劉心皇、尹雪

〔註5〕 劉登翰：《臺灣文學史》（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25～43。

〔註6〕 古繼堂：《臺灣小說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頁155。

〔註7〕 古繼堂：《簡明臺灣文學史》（台北：人間出版社，2003年），頁250～251。

〔註8〕 趙瑕秋、呂正惠主編：《臺灣新文學史思潮史綱》（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頁247。

曼、司徒衛等為代表的（以國民黨立場為主的）中國右翼立場；以陳映真、呂正惠等為代表的中國左翼立場；以葉石濤、陳芳明等為代表的臺灣本土／臺灣本土現代派立場；以夏志清為開端不帶有政治性的西方現代主義美學論述。

前三者傾向於以民族／國族／政黨政治意識作為文學歷史的書寫主體的前提，後第四者則傾向於以西方現代主義的個體性美學價值作為書寫策略、表現歷史或論述文學基礎。但都因其自身條件的設限，難以對反共文學歷史作更全面性的深入理解。

例如：中國右翼維護國民黨正統的「官方」詮釋史論，在失去歷史環境與政治力量的支持，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繼承領導中國的政黨合法性，如何還能繼續宣稱國民黨的反共是中國歷史的唯一正當性？這個史論觀點的政治性謬誤，仍有必要被釐清。

中國左翼與臺灣本土詮釋脈絡，對於反共文學的歷史客觀性的存在意義，一律取代以價值批判。這個現象與其各自依循的中國左翼民族意識與臺灣民族意識，將文學歷史混同於政治上的統、獨意識形態之爭，不無關聯。因此，對反共文學的否定，不管從文學的政治性與審美性，都有難以持平之處。

又例如：反共文學中寫實主義式的敘事修辭與美學成規，來自於對左翼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文化符碼與文學成規的吸收。臺灣本土詮釋系統，雖然站在日治時代臺灣新文學「反帝、反封建」的寫實傳統，並作為建構臺灣文學史中的寫實主義文學歷史根源，但未能更客觀梳理日治時代中，臺灣新文學左翼傳統與三〇年代共產國際在日本左翼、中國左翼之間，所存在深遠影響的歷史關係。

這使得反共文學雖然有截斷臺灣日治時代新文學寫實傳統的歷史現象發生，卻不能忽略：反共文學只是排除左翼文學寫實主義中的現實批判意識，但仍具有持續影響寫實主義的文學審美形式在臺灣文學發展上的「主流」位置。中國左翼詮釋系統也同樣必須正視反共文學對此的正面性影響。因此，反共文學真的是一種逝去的文學？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如何看待這個最被貶抑、但卻是臺灣文學經驗中，具有關鍵（／矛盾）意義的一個歷史性環節？

宣稱作為現代派個人立場所認定對立面的張誦聖，提出以「文學體制」分析現、當代中國／臺灣文學的方法學。她以「東方主義」運用「論述理論」

訴諸潛在集體動機的觀念為基礎，透過「文學體制」——既是現象又是概念的特殊性，整合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使得文學權力與社會結構力量的複雜關係被解析出來，進而能發現具有歷史特殊性的當代文化現象的系統性。

張頌聖在西方現代主義論述的脈絡下，跳脫單純的美學的藝術性評價，僅以西方現代主義的個人立場作為研究態度的基礎，而將研究對象轉往文學現象與社會體制之間互為影響的社會性意義，對開發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的文學社會意義，相當具有啟發性，但五〇年代反共文學非其研究重心〔註9〕。

應鳳凰則以此研究概念為基礎，從文獻史料的整理，重新梳理並描述出臺灣五〇年代的文學場域，到提出反共美學的建構議題，到援引布赫迪厄理論中的文化場域、文化再生產、文化資本等觀念，討論文藝雜誌、作家在文壇或文學史書寫的位置〔註10〕，是目前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研究中，最具整體性理論建構的學者。

王德威的〈五〇年代反共小說新論——一種逝去的文學？〉也同樣不單純設限於西方現代主義的美學價值觀論述上，將文學研究擴大到文學與歷史如何互動的思考層面，因而極具研究視野的啟發性。王德威從反共文學的政治小說的歷史性格與意識形態觀點，以及兼具傷痕文學的特殊屬性，辯證了政治與文學之間種種的複雜關係，重新提出反共文學研究的可能新起點。梅家玲在此基礎延伸，從性別論述出發，重新梳理反共文學在「家國想像」中，所形成的「家」與「國」界域〔註11〕。

到了〈歷史與怪獸〉，王德威則走得更遠，受啟於西方論述而不為其所設限，從中國史學敘述的傳統另闢蹊徑，揭示出（中國）傳統性在中國／臺灣現當代文學的現代性發展中所隱續的意義脈絡〔註12〕。

〔註9〕張頌聖：〈「文學體制」與現、當代中國／臺灣文學——一個方法學的初步審思〉，收錄於周英雄、劉紀蕙主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頁25～40。

〔註10〕應鳳凰：〈文獎會與文藝創作出版社〉、〈結合文人力量的前鋒〉、〈《自由中國》、《文訊通訊》作家群與五〇年代臺灣文學史〉、〈五〇年代臺灣小說「反共美學初探」〉、〈五十年代臺灣文藝雜誌與文化資本〉；博士論文：Reassessing Taiwan's Literary Field of the 1950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2000。

〔註11〕梅家玲：〈五〇年代國家論述／文藝創作中「家國想像」——以陳紀澄反共小說為例的探討〉、〈性別 V.S. 家國：以五〇年代的臺灣小說——以《文藝創作》與文獎會得獎小說為例〉，《台大文史哲學報》2001.11，頁5～46。

〔註12〕王德威：〈序論〉《歷史與怪獸》（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頁7～8。

上述學者們的研究雖然都有助於反共文學在文學現代性與現代化研究視野的開展，但卻也都因限於西方現代主義個人主體價值的美學立場，未能將第三世界國家在文學與民族國家建構之間，以及與民族文化傳統的複雜關係，視為主要關懷。中國左翼與臺灣本土立場的學者雖也注意到這個現象，並提出諸多精闢論述，但因政治意識形態的侷限，將反共文學在此所能開展的歷史詮釋意義排除在外。

臺灣本土學者游勝冠堅持以「臺灣本土」的政治性戰鬥位置介入臺灣文學研究，以此對抗臺灣文學中的「中國性」與戰後臺灣發展（現代主義）「現代性」之間的權力共謀結構〔註13〕，以期重新建立臺灣本土意識的學術主體性。雖然能夠積極開發臺灣本土意識的文學新論述，但將學術知識研究轉為帶有去中國霸權意識的政治性行動綱領，卻極易在新論述建構的過程，同時混淆著個人主觀政治意識形態所預設的價值批判，而難以與歷史作更寬廣的對話〔註14〕。

我的問題意識則試圖透過提問反共文學可能潛藏的歷史意義與歷史價值

〔註13〕 游勝冠：〈權力的在場與不在場：張誦聖論戰後移民作家〉、〈徘徊於左、右立場之間的論述——再論張誦聖教授臺灣文學論述中真理與立場的共謀〉、〈揭開「現代主義」、「前衛性」的神秘化面紗——論外文系出身的戰後移民學者反本土論述的意識形態位置〉，臺灣文學研究工作室（<http://ws.twl.ncku.edu.tw>）。

〔註14〕 游勝冠指導王梅香的碩士論文《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〇年代反共文學、現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中，（在陳映真對現代主義與國民黨政治力共生互謀關係觀點）提出反共文學、現代主義在五〇年代共舞過程，隨著三種不同歷史驅力的推移——反共文學本身的改變、自由主義思潮的刺激、美援文化的輸入，而漸由六〇年代現代主義取得主導位置，並使得現代主義文學與美學價值觀獲得有利的傳播途徑與認同。以現代主義背後的「反共性」、「中國性」與「現代想像」之間的共謀權力網絡，以及站在文化地理性的族群階級與文化資源的文學社會角度，作為反省國民黨政權長期以來重北輕南政策下「台北中心」思維的偏頗，這是很好的一個省思批判。但論文立場仍有值得爭酌之處：站在對戰後現代主義發展的（相對於國民黨政權主導的「中國性」）的「政治性」戰鬥位置，以（臺灣V.S.外省／本土V.S.中產階級的）族群／階級的文化資本與社會位置繼承的批判，無視於現代主義本身所建立的美學規範，又該如何評價或審視臺灣本土的「現代主義」的現代性發展意義？如日治時代優秀詩人楊熾昌與其「風車詩社」，或是有臺灣文壇「幻影之人」的優秀小說家翁鬧。因此，「政治性戰鬥位置」雖能有效建立批判觀點，但從確立學術研究主體的觀點來看，如何回應或建立更宏觀的歷史視野與思考空間，仍有所保留。

爲主軸，並企圖整合上述學者們的研究脈絡，包括不帶政治性的臺灣主體意識與文學歷史立場、中國左翼文學史論者的唯物辯證史觀與非直線式歷史脈絡的文學史書寫、張頌聖的「文學體制」的研究觀點，以及王德威對於政治與文學歷史之間的辯證性，重新梳理反共文學在臺灣現當代文學所可能提供的社會性意義。

透過整合性的研究向度與非政治立場重新觀察，並試圖建構臺灣五〇年代反共文學論述，最主要的理由在於：中國左翼文學史論者的文學歷史書寫，雖然具有以客觀的文獻資料勾勒出反共文學在臺灣五〇年代的發展面貌、注意到不同歷史脈絡所發展的文學創作與各種文學思潮之間的消長現象的優點，但以傾向（中國左翼）民族立場與政治意識形態，對反共文學的國民黨政治文宣功能作了價值的判斷。

因此，在歷史的書寫特質上，來自於唯物辯證史觀的運作，使得文學歷史在文學價值的判斷之外，仍保有現象與現象之間的客觀性，避免直線式的文學歷史書寫。但往往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容易設限於國族——政黨意識形態的彼此對立立場，未能更宏觀於文學歷史發展的整體複雜性，使得文學歷史與文學價值判斷，混淆於政治的意識形態中。

因此，避開政治意識形態，將反共文學視之爲中國右翼建立現代化民族國家時、所發生的文學政治化現象。進而檢討文學政治化過程中，所對應的歷史、文化與社會關係。這些關係的整合，是否可能重新發現反共文學所特有的結構性意義的文學歷史詮釋？這也指出訴諸現象的歷史客觀意義而非文學價值，作爲我的論文研究的預設價值立場。

就現象的歷史客觀意義來說，無論維護反共文學存在意義的政治立場、或貶抑反共文學的存在價值，都不能反駁反共文學的生成，來自於國民政府退居臺灣的歷史環境，以及在這個歷史環境中，因勢利導的政治力量。不管是好或壞，這都是臺灣歷史的一部份。「文學體制」觀念的援引，對於反共文學的生成，與後來取得五〇年代文學發展的主導地位，使我們對反共文學與社會的各種結構力之間的張力關係，有了絕佳的觀察平台，而不容易流入政治情緒的認同或抵抗。

不過，這裡出現一個問題：反共文學在當時是否已經形成了「國家體制」的規模？還是僅僅只是作爲控制社會體制發展的「機制」功能存在？如果只是形成社會體制化的「機制」，尙未達到「國家體制」的規模程度，這對其他

文學類型或文學思潮的發展，留下了什麼樣的空間？對反共文學的發展，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從臺灣文學史論中，對於反共文學主導五〇年代文學語境的認知，和反共文學在當代所實際產生的效應，又將會產生了什麼樣的落差？

再反向就反共文學在目前史論所出現的文學價值意義來看。政治與文學之間的密切關係，使得反共文學的價值判斷來自於政治，而非單純的文學審美。因此，反共文學集體書寫的「八股」，如果不從政治意識形態美學的「再發現」觀點探討，也不著重於事過境遷後，對於文學歷史心理的認識與反省；反共文學在文學與歷史之間，還能存著怎樣想像性的對話可能？想像對話意味著文學歷史的再現，是否能提出更具有政治與文學辯證性的文學歷史詮釋？並提供重新書寫反共文學在臺灣文學史的空間？反共文學歷史的研究與詮釋再發現，將是一個很好的起點。這也是本論文所預期開展的研究重心與論述成果。

第二節 研究主題、概念界定、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論題是「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臺灣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研究」。「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歷史」、「文學敘事」是本論文對「反共文學」主題所預設的三個研究進路。

「意識形態」概念的產生源自西方的啓蒙運動，形成於法國大革命之後，首先由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所提出。戴維·賈里（David Sollins）、朱莉婭·賈里（Julia jary）《社會學辭典》（Sociology-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中，對「意識形態」所下的三個定義：一、作為社會活動或政治活動的基礎或指導的一切思想體系；二、較狹義只證明一群體統治另一群體合理或合法的一切思想體系；三、一種包羅萬象的廣博知識，它能消除偏見，並用於社會改革（註15）。

「政治意識形態」在本論文的使用概念，傾向於第二個用法，但以臺灣五〇年代的國民黨作為具體指涉對象。「政治意識形態」在本論文所形成的論述脈絡內容，包含兩個向度：一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革命）建國」政治

〔註15〕戴維·賈里、朱莉婭·賈里（周業謙等譯）：《社會學辭典》《臺北：貓頭應出版社，2005年1月》頁324~325。